

《史记》综论

肖振宇○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史记》综论

肖振宇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史记〉综论》是一部对《史记》和其作者司马迁诸多问题研究的学术专著,由作者论、著作论、人物论、杂论四部分三十个论说问题构成。著中针对司马迁的精神、思想和《史记》的取材、体例、写法、影响、人物认识评价、句义段义、人物姓氏等问题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见解,其中许多见解是发他人之所未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综论/肖振宇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646 - 2909 - 0

I. ①史… II. ①肖…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
传体②《史记》—研究 IV. ①K2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163 号

书 名 《史记》综论

著 者 肖振宇

责任编辑 齐 畅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5 字数 22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在对《史记》的解读品鉴中默默求索^①

——肖振宇教授的《史记》研究

(代序)

傅金祥^②

显学之所以成为显学,能吸引众多学人为之孜孜以求,乃因为其博大精深的内涵、灵魂和气象,无疑《史记》研究可谓显学中的显学。《史记》这棵生命之树何以根深叶茂,长盛不衰?张大可先生所言是精辟而全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具有独特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国人的根柢书。此外,它还体现出四大特点:第一,是民族文化的浓缩;第二,是反映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第三,其历史与文学的成就遗泽后世;第四,司马迁崇高的人格、创新的精神激励人生奋发有为。”^③正是为这一切所激励,肖振宇教授为《史记》研究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

肖振宇教授的《史记》研究涉及面相当宽广,仅笔者所见到的,就有近30篇相关论文,分别发表于《文学遗产》《文史知识》《民俗研究》,以及许多高校学报等学术期刊和公开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其研究内容涉及《史记》叙事策略、写作艺术,司马迁的思想和人格,《史记》人物评判,《史记》人事及地点考辨,《史记》的民俗文学研究,《史记》与其他著作的传承研究等诸多方面。

① 此文原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略有改动。

② 傅金祥,1957年生,男,山东利津人,淮海工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写作学方面的研究。

③ 张大可.《史记》的民族凝聚力与研究现状[J].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79-87.

对于《史记》这样的史传文学的解读品鉴,无疑是在探索历史和人的精神世界。而文学本体论的研究和解读,更能够充分展示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感悟力。这种培育民族精神、滋养人类智慧的功能,已化为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可谓“大器无形,大音希声”,将会伴随着人类前行。肖振宇教授的《史记》研究,主要是着眼于文学本体视角。在《史记》叙事的结构运筹,以及具体篇目的叙事策略、写作艺术方面,他倾注了较多的笔墨。比如,在探讨司马迁《史记》人物合传的具体运作上,他对诸多篇目做了细致的解析和归纳,他认为:“司马迁把一些人物用合传来写,大体基于官职、事件、才智、遭遇等几方面的考虑。虽然都是人物合传,但司马迁却采用了分写、混写、引写、附写等不同的方法,收到了较好的写人、记事的效果。”^①关于司马迁对“李将军”的叙写策略,他认为:“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值得称道,令人同情。但客观地讲,李广身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点,对此司马迁也是心知肚明。但司马迁由于个人对李广的偏爱,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他运用突出优点、弱化缺点、突出不幸、显示其悲的撰写方法,增强读者对其的好感,博得人们对其的同情。对此我们不能责备司马迁,但我们应对司马迁对所喜爱人物的撰写方法有所认识。”^②无疑,这见识是极中肯的。另外,对《史记》的戏剧性、《史记》风俗习性的记写特点、《史记》论赞议论特点、《史记》人物附传、《史记》复写策略,他都做了细致精到的探析,可谓细微深处见功夫。

《史记》的民俗文学研究以及《史记》与其他著作的传承研究,是肖振宇教授《史记》研究颇具特色的方面。在论及民间文学对《史记》取材的影响时,他认为:“《史记》取材于民间文学是因为正

① 肖振宇.《史记》人物合传论[M]//安平秋,杨福平.逐鹿中原(史记论丛第三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25-335.

② 肖振宇.从《李将军列传》看司马迁对所喜爱人物的撰写方法[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4):3-5.

式史料缺乏,民间文学有重要历史价值,司马迁的浪漫尚奇。《史记》取材于民间文学的原则标准有选取‘历史化’的典雅者,与‘究天人之际’有关者,符合‘尚奇’审美要求者。《史记》取材民间文学,大大增加了其文学色彩。”^①这些见识是极为精深的。着眼《史记》对中国叙事文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他以《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具体影响为题,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叙事技巧、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方面对二者的传承关系作了详尽的考察讨论,从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论〈史记〉的戏剧性》一文中,他从戏剧矛盾冲突、戏剧情节结构、戏剧语言等多方面全面考察了《史记》的戏剧性特点,从而得出结论:《史记》对后代戏剧的形成和发展,是产生了影响、作出了贡献的,《史记》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理应有一席之地。这类研究的文学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史记》之所以成为“史记”,而非历史陈迹的简单累集,之所以为后人高山仰止,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价值观、高尚的人格理想是分不开的。曹晋先生曾谈道:“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它浸透着作者的滔滔情思和进取的人生观。”^②对此,肖振宇教授也有着深切的思考,在他看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史家撰史的动机,是史家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界,但真正能做到绝非那么简单。这需要史家的史识、史见、史才,更需要史家的人格修养作基础。近年来,他对司马迁的妇女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为人处世思想及人格理想,《史记》在中国传统为人处世思想的传播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做了多方面的探究。

对《史记》人物评判、人物及地点考辨,肖振宇教授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关于“刘邦将其子女推于车下地点的考订”,关于“秦始皇赵姓原因”的考订,对《史记》中魏公子、叔孙通这些人物的新思

① 肖振宇.论民间文学对《史记》取材的影响[J].民俗研究,2001(2):93-100.

② 曹晋.《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J].文学评论,2000(2):40-48.

考。这类研究工作,无疑也是《史记》研究中需不断有所发现,常说常新的课题。

对于《史记》研究,尤其是文学视角的研究而言,古典文论、中国传统美学根基无疑是重要的。所幸肖振宇教授在《史记》研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诗歌鉴赏理论及诗歌鉴赏史,并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使他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古代文论学养,能够以中国传统的诗性智慧、诗性情思来切入司马迁及《史记》,而这无疑为《史记》研究,尤其是为《史记》写作艺术的品鉴探讨奠定了理论根基。比如,关于司马迁《史记》“尚奇”的审美追求,《史记》人物性格的变易性,司马迁写人的虚实结合,《史记》的戏剧性,等等,这些审美视角对于《史记》的解读是很有效的。他的《史记》写作艺术研究,往往能够做到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由形及神,对事件、人物的细微处把握得比较精准。他努力切入文本,于字里行间探讨司马迁的真用意,真性情。他所崇尚的是抽丝剥笋般的分析,默默涵泳中的深切体味,别开生面的阅读感悟。虽不专事理论,而不乏理性穿透力;不专事抒情,而自有激情与灵性在。

肖振宇教授《史记》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始终注意提高与普及相结合。他认为,作为高校教师,《史记》研究应该与对学生所进行的文学教育、人文素养教育紧密结合。他先后在几所高校担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职务,但他所开设的《史记》研究的选修课程始终没有间断过。对于《史记》这种民族历史文化经典来说,将学术研究与教学紧密结合,唤起青年学生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敬畏感,无疑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的环境中,肖振宇教授在《史记》这类典籍资料中默默地爬梳,探石发穴,钩沉勘谬,是需要耐得住清苦和寂寞的。不过在肖振宇教授看来,能够探寻前人足迹,与先贤对话,实乃人生之快事。长期的《史记》研究所接受的司马之风,涵养了其个性:正直、淡泊、严谨、求实,自然这也是治史治文必须具备的品格。对

于《史记》研究来说,用意也只能在于,扎扎实实地做些基础性、建设性的积累与普及的工作,而这也恰恰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所需要的。

肖振宇教授并不满足于自己已做的《史记》研究工作。他还有许多新思考:他时常与笔者谈到,如何看待传记体史著的特点、优长与局限?如何看待前人所指出的《史记》细节的虚构问题?如何看待《史记》人物类传的写法问题?对《史记》研究而言,历史评价、道德评价、审美评价诸视域之间应如何相互融合,相互尊重……我们期待他取得更大的收获。

目 录

在对《史记》的解读品鉴中默默求索
——肖振宇教授的《史记》研究(代序)/傅金祥

作 者 论

- 司马迁的妇女观/3
- 司马迁的处世思想/10
- 司马迁的用人思想/19
- 司马迁的创新精神/31
- 司马迁对屈原《离骚》的鉴赏/37

著 作 论

- 论《史记》取材于民间文学/45
- 《史记》人物合传论/55
- 《史记》人物附传论/67
- 《史记》类传及其撰写特点/81
- 《史记》复写探析/92
- 简论《史记》叙事中的议论/102
- 论《史记》的戏剧性/115
- 《史记》人物性格论/125
- 论《史记》中哭的叙写/129

- 论《史记》的对比艺术/138
《史记》与《聊斋志异》/152
《史记》人物传记开头简论/163
《史记》论赞的议论特点/169
《孟子荀卿列传》的撰写方式/176
《史记》风俗习性的记写特点/182
《货殖列传》体例平议/195

人 物 论

- 对魏公子的新思考/207
刘邦的统御之术/211
韩信被杀的自身原因/217
为叔孙通正名/222

杂 论

- 秦吏逐客之议的深层原因/231
从《史记》《汉书》看秦及汉初妇女再婚/234
“马童面之”解/238
读书札记二题
——兼与赵光贤先生商榷/241
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提供全面及时正确的信息而不断前进
——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4—2007年卷/250

参考文献/257

后记/260

作者论

司马迁的妇女观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物、对事件,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对待妇女的观点态度上,他就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较大的不同,具有进步意义和超前性。

首先,司马迁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奴隶和封建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她们除了受阶级压迫外,还要受男权的欺凌和人们的歧视。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中多有反映。如《诗经·小雅·斯干》写了妇女一生下来就受到人们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如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①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头脑中的男尊女卑观念。孔圣人对妇女的歧视更是赤裸裸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②不管什么样的女子统统都被他打入“小人”之列。西汉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发展,妇女所受到的压迫、欺凌、歧视也就越来越重。一些妇女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男子们政治、外交斗争的工具或骄奢淫逸的玩物。如刘邦、刘盈、刘恒、刘启几位汉朝皇帝,都曾为取媚于匈奴,送宗女嫁给单于,还美其名曰“和亲”。又如《张丞相列传》^③记载,汉文帝时的丞相张苍,辞职还家,“老,

① 袁梅. 诗经译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81:98.

② [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526.

③ 本书在讲到《史记》各篇时,如《××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太史公自序》等,均省略“史记”二字。

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①。在这种观念下，在这样的社会中，妇女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因此，在我国历史文化典籍中，记载妇女人物生平事迹的就非常少，即使有一些，也是章节片段，往往还是作为男子的附庸陪衬出现的。但司马迁在对待妇女的观点态度上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较大的不同。他比较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史记》中，他不仅为众多男子树碑立传，而且也为许多妇女树碑立传。如《吕太后本纪》就是一篇单独的妇女人物传记。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以客观的态度，如实地写下了吕后一生的功过是非，把一个多面的、完整的妇女人物留给后人，并根据她在汉初政权中的实际地位，将其列入“本纪”中。司马迁把吕后写入本纪，有些人很不以为然。像刘勰、司马贞、梁玉绳等文论家、史学家就曾批评、指责司马迁此举。他们或批评、指责司马迁不应把吕后写入本纪，或批评、指责司马迁就不应该如此详细地记写吕后这一妇女人物。但他们的批评、指责，恰恰反映出司马迁不以性别论尊卑的求实精神。这正如清人徐时栋说：“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纪》前，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后，不立孝惠皇帝本纪，而独立《吕太后本纪》，因以本纪为纪实，而非争名分之地也。此后无人能具此识力，亦无人敢循此史例矣。”^②这话说得极为正确。司马迁没有因为吕后未正式称帝，而取消其进入本纪的资格，更没有因为她是一位妇女人物，而降低或抹杀她的社会历史地位。这反映出司马迁在妇女问题上，他的观点态度不仅超过前人和同时代人，而且还领先于后人。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妇女单独立传的还有《外戚世家》一篇。在此篇中，司马迁写了几位妇女的生平事迹：写了薄太后从一个受冷落的妃子，终于当上了皇太后的经历；写了窦太后从一个宫女，几经周折，经于登上了皇太后宝座的过

①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682.

② 韩兆琦. 史记选注集评[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20.

程；写了王太后先嫁金王孙，后嫁皇太子，并得到宠幸，当了皇后的趣事；写了卫皇后最初受宠，后色衰爱弛的变故；写了李夫人一家由有幸到被族的遭遇。这些妇女的身世生平，有的令人羡慕，有的令人同情，有的令人惋惜。司马迁不仅把她们记录下来，使她们流传于世，而且还把她们列入“世家”之中，与男性诸侯比肩，这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视。在《史记》中，司马迁虽未给一些妇女单独立传，但在写其他人物的同时，也较详细地记写了她们的事迹，让她们在历史人物画廊中占了一席之地。如在《晋世家》中，写了甘愿与儿子过隐居生活的介之推母；在《赵世家》中，写了以身殉夫，以身殉国的代王夫人；在《陈丞相世家》中，写了小肚鸡肠的陈平嫂和为激励儿子死心踏地保刘邦而伏剑自刎的王陵母；在《楚元王世家》中，写了自私吝啬的刘邦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了能明辨是非、以国为重的赵括之母；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了施恩并不图报的漂母；在《刺客列传》中，写了激于义理，不避自身之祸，为弟扬名的聂紫；在《货殖列传》中，写了善于经营商业的巴寡妇清。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由于司马迁的记写，使众多妇女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亮了相。她们的人、事，有的成为后人学习效仿的楷模，有的成为后人引为鉴戒的事例。这正如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中所说：“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①

其次，司马迁肯定妇女的积极社会作用。妇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轻视妇女的观念作怪，人们对她们的作用、贡献，或充耳不闻，或视而不见，甚至抹杀她们的作用、贡献，把“女人是祸”、“女人败家”、“女人亡国”等一盆盆污水都泼在妇女身上。如周武王就曾讲过这样污蔑妇女的话：“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②齐桓公也曾与诸

① 白寿彝. 史记新论[M].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1: 74.

② [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83.

侯盟誓说：“毋使妇人与国事。”^①在中国历史上，这两个较开明和有作为的国君，对妇女的社会作用都持这种观点态度，一般人则可想而知。司马迁在对待妇女的社会作用问题上，没有苟同前人完全抹杀、彻底否定的观点，而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在《史记》中，他对妇女所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或明确发表议论给予肯定，或如实地叙写她们的作为，曲折地给予赞扬。如在《外戚世家》中他就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娥，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②这里司马迁指出，历史上国君掌权治国，不仅是依靠他们自身的才能，而且还要依靠身后的“内助”。“内助”好的就起积极作用，“内助”恶的就起负面消极作用。这种不以性别作为评判标准，而是根据历史实际情况，评说某些女子的社会作用，是客观的、公允的、实事求是的，比起那些不论是非，不分曲直，凡妇女皆败家亡国的观点来，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又如司马迁对吕后这一人物，在其本纪中，写了她的权势熏心，凶残忌刻，营私结党，是以揭露为主，写出了其身上恶的一面，但在最后的“太史公曰”评论中，仍然给予她这样的评价：“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若，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穡，衣食滋殖。”^③司马迁对吕后执政时期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对社会生产恢复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在其他传记中，司马迁还写出了吕后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在《高祖本纪》中，写她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为刘邦建立稳定的后方，帮助刘邦打天下，使国家较快地实现了统一。在《季布栾布列传》《匈奴列传》中，写她忍受个人所受的侮辱，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了汉与匈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96.

②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67.

③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412.

奴的关系,避免了战争的爆发,使国家能够有机会继续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司马迁对吕后这一妇女人物,既揭露了她恶的一面,又非常客观公允地肯定了她所起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十分可贵。在《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肯定赞扬了缇萦这一下层女子对社会所起的巨大作用。传中较详细具体地写了缇萦救父上书,不仅为父申冤,而且使汉文帝从此废除了肉刑。这样就让更多的人免遭肉刑之苦,社会向文明的境地又前进了一步。缇萦这一女子所做之事,是众多男子也难以做到的,故东汉班固在《咏史》诗中赞扬说“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班固是用诗直接肯定赞美,司马迁是寓肯定赞扬于叙事之中,观点看法一样,只是肯定称赞形式不同而已。但司马迁肯定赞扬在前,班固肯定赞扬在后。

再次,司马迁赞颂妇女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行为。可以说中国自奴隶制社会以来,统治者和一些思想家们,便造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像《易·恒》中所说:“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①,就是一女不事二夫、夫死不得再嫁的最早提倡。《诗经·齐风·南山》中所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②,反映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男女婚姻的限制。当然也有少数大胆的女子,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于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但她们的行为,往往遭到人们的指责和社会的鄙视。孟子就曾讲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③司马迁虽然生活在礼法信条已被封建卫道者们制造得更加完备、对妇女的压迫更加厉害的西汉时代,但他对妇女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违礼”行为,没有向前人和时人那样“贱之”,而是给予热情的赞颂。如在《史记》中他就以生花妙笔、用赞颂的口吻,生动地记写了一些妇女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与所爱者终成眷属之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48.

② 袁梅.诗经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1:279-280.

③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11.